

# 总 论

- 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 —— “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十五条）
- 积极稳妥地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及改革战略



# 中国经济改革的下一步

——“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 一、正确把握经济转轨的含义和目标

波兰总统经济顾问、波兰前第一副总理科勒德克先生认为，经济转轨和改革是有区别的。转轨是从基于国家控制产权的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在于通过一些改进而非根本制度的变化来对现存制度进行完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改院院长高尚全教授提出，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的经济转轨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征体现在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民主政治等五个方面。

美国斯坦福大学青木昌彦教授提出，体制转轨的道路在转轨国家之间呈多样化，它们的经济效果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在这些国家是共同的，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具有扎实基础的，是不可逆转的

## 二、正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和挑战

1. 经济全球化实质是全球经济市场化，对转轨国家带来的机遇大于风险，它将使转轨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科勒德克等代表认为，全球化自 500 年前出现了第一个突破——基于全球贸易的殖民主义阶段；19 世纪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第二个突破——贸易和生产的大幅度提升；当前伴随社会主义经济转轨是第三次突破。辽宁大学徐坡岭副教授等人认为，只有经济转轨开始后，“两个并行的世界市

场”的相互融合和全球经济制度的市场化趋同才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市场基础，也才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中改院课题组认为，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提供新的动力，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对改革进程提出新的要求。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转轨是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也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标志。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

2. 应当正视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国家带来的挑战和深刻影响。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等认为，经济全球化将在多个层面对经济转轨国家的制度安排产生影响，如跨国公司的投资不仅改变民营企业的财产结构，而且通过参股等多种形式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必然改变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市场结构；使政府的行为规则适应国际统一规则，对政府体制和行为方式提出挑战；使人才流动、劳动力的流动不可避免，价格与国际市场应大致均衡，这将对国内、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造成冲击。也有代表提出，伴随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进程，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人力资本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必须要重视和提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产权及其实现程度。此外，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将对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影响。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3. 制度需要学习，渐进式的方式有利于保持经济转轨的稳定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与采取激进的“休克式疗法”的东欧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相比，采取渐近方式转轨的中国取得了更好的成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提出，过去 20 多年中国经济制度转轨具有双重性：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由农村提供资金的工业经济向以工业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转变。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有学习的过程，才会产生应有的制度效应。俄罗斯经济分析局副局长伊夫基尼·加立勒科夫认为，利用均衡分析的方式理解转轨经济的尝试很可能走入误区。中国经济成功转轨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改革重点的选择与社会承受度的统一，使改革取得了最大的社会支持。

4. 警惕全球化给转轨国家带来的负面效应。科勒德克提出，新兴市场有新兴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已经制定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国家可以剥削新兴市场的资源。中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依赖性的资本主义，过于依赖外来的资本。目前波兰 85% 以上的银行已经为外资所控制。《改革》总编廖元和认为，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 40%，而美国日本等国才 20%。常修泽教授也提出，要避免我国改革出现“拉美化”的后果。

5. 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和体制创新。中改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我国按照 WTO 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广东省社科院赵琼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制度创新的影响主要是，WTO 规则提供了总体的原则和制度框架、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内的总体制度的变革。廖元和研究员认为，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应“海洋战略”与“大陆战略”并重，加强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转轨已经到了关键阶段，必须加快改革进程，注重体制创新。

### 三、发展和完善经济转轨中的基本经济制度

1. 深化认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四川省社科院林凌教授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理解、分析很重要。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非公有、国有、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份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要使它变成整个经济中的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相互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因此，发展的结果，整个的微观经济的基础应当是混合经济。这个混合

经济本身就是公有制经济，最重要的表现是股份制形式。因为实行股份制的结果，大量的资本变成了社会资本。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南泉教授提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把过去统一的、过分集中的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俄罗斯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俄私有化首先是作为一项政治纲领提出来的，有其十分明确的政治动机；为了实行私有化的上述政治目标，俄采取了强制的方法来改造国有企业，企业不可能具有适应的市场应变能力；私有化为原领导人与投机者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私有化形成了以金融工业集团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私有化之后产生的新企业主对企业的发展没有长远考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在短期内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上。

2. 正确认识非国有经济的积极作用，创新观念，消除限制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环境。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提出，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国有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体制中去。判断经济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持续增长需密切注视体制结构中国有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的变动速率，以及决定它的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动情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邹东涛教授认为，必须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剥削、社会政治地位进行客观、深入地分析，在理论上、政策上提出与时俱进的战略构想。要正确确立私营企业主的地位，私营企业主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劳动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铁柱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化问题为：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机制，进一步参与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渐把封闭的家长式企业改造为开放的法制的企业。与会代表认为，要打破当前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快速发展，提高社会整体资源的配置效率。

3. 经济转轨中应当避免矫枉过正，不应歧视国有经济。科勒德克提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教训表明，在推进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中，应当避免矫枉过正，避免对国有企业的歧视政策，应当珍视国有企业的特殊作用和积累起来的理性经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研究员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原因不在于所有者缺位，而在于所有者代表太多，在存在多个委托人的情况下，目标函数存在冲突，导致失效。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整合所有者的代表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陈淮研究员认为，当前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国有经济，或者单纯用民营经济取代国有经济。我们实际上是要找到一个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的一种方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林跃勤博士认为，促进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要注重搞好制度建设、加强政府支持与调控、形成主业突出的拳头优势、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集团。

4. 切实减少政府干预和防止新的政企不分。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廖明研究员认为，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政府对企业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林凌教授指出，从中央到省甚至市建立大型企业工委容易形成新的政企不分，不利于推进国企改革。

5. 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务实推进产权改革。陈淮研究员认为，经济转轨中的产权关系中新的变化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产权的市场化以及全社会产权构成方式的调整。产权的市场化不仅包括资本市场这样的公众化、社会化的方式，而且还要包括全社会多层次的产权交易渠道。中改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可以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魏加宁研究员提出，职工持股的实行如果没有相当的比例和定的数量，就不可能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职工也没有监督企业或者经营单位的积极性。也有代表提出，在产权

改革过程中，既要强调物质资本的产权改革，更要重视和强调人力资本的产权改革。从国有净资产的增值部分拿出一块来实现企业家价值和推进职工持股制度，这不能算作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对企业家和职工付出劳动的应有报偿。

## 四、积极稳妥推进经济转轨中的政府改革

1. 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全国人大常委阮崇武指出，市场经济转轨确实要求政治体制改革配套，但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稳步推进，不能过急。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上，政府过于强势不利于活跃市场，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另外，在农村应当加强社会基层基础建设，在城市应当推动社区建设。新时期应当有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人民自主性增强，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科勒德克提出，从长期来讲，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之间有着积极的互动。作为决策者要创造一种民主的环境，在此环境中再做出决策，使大多数人受益。林凌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在改革中是双重身份。既是改革的领导者、推动者，本身又是被改革者。改革应努力做到决策程序的民主化。

2. 强弱有度，合理划分事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许多专家指出，政府职能转换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必须与变化了的市场竞争环境相适应，政治改革的进程必须与经济改革的进程相均衡。亚洲研究所所长江春泽研究员指出，经济转轨期间，政府的职能不能简单地弱化，更不能取消，而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积极地改革和转换。苏格兰斯特拉克立德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罗斯教授提出，政府的优势就在于集体防卫和集体行动，统一货币；缺点在于政府权力的行使有可能导致市场的不完善和不完整。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信息自由方便地流动，互联网上有大量信息，需要政府的引导。这对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国家计委宏观院银温泉研究员指出，行政性分权体制的形成和演进导致了地方市场分割，地方市场分

割是体制转轨过程的必然产物。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教授认为，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凡具有全国规模和全局性质的，应当由中央政府进行决策和组织提供，凡具有地方规模和地域限制的，应当由各个不同的地区分头决策和组织供给。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计划生育等在实践中不应由地方政府或个人负担。

3. 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两面性，要防范金融和财政双重风险。许多代表指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非常有利的措施。但也应重视发行国债对今后改革和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创造出新的保持原有体制的国有企业，增大国企改革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债的发行，强化了已经存在的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不仅效率低，而且成为寻租和腐败的根源。此外，专家们提出，金融风险 and 财政风险在我国现阶段是同时存在的。进一步推进改革，必须把财政和金融这两者的风险联系在一起，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联系起来，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联系起来，防止金融和财政双重风险。

4. 加快立法进程，以制度安排保证改革成果。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副司长于吉研究员指出，市场经济是依法规范的竞争经济，在经济转轨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应当通过各种相应的法规来调整和规范。南京大学法学院范健教授提出，现阶段中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要在完善商事立法的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调整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和调整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加快政府改革，健全法治，加强民主监督，从体制上确保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5. 打破垄断，坚决防止体制性腐败。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最严重的腐败形式之一，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应充分利用 WTO 的规则来规范市场行为，使政府从无所不包逐步过渡到公开、透明、高效、廉洁。对于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的内控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对金融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督。惩治腐败既是向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重要保证，也是完善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新时期政

府经济职能的必要条件。

6. 重塑政府信用体系。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陈文玲研究员指出，由于我国信用等级低，无形中加大了我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成本。不少与会专家提出，构筑良好的政府信用，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营造使企业健康快速发展的信用环境，是各国经济转轨中的重要内容。

## 五、必须重视经济转轨中的社会改革

1. 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改进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状况。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转轨 20 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总趋势是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赵人伟研究员认为，经济转轨中的许多不正常收入乃至非法收入都同转轨时期的种种无序状态有关。只有深化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的不平等问题。改进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必须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改进补贴和税收两种手段，并改进教育、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转换等整个宏观经济政策。

2. 在发展中解决经济转轨中的就业问题。有代表指出，我国的就业、失业问题非常突出，应该把促进就业作为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应与发展相结合，避免大包大揽。应该进行改革，使就业成为全社会的事情。科勒德克建议，对转轨中的失业，应该用一种非常谨慎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迅速发展社会保障来解决。要解决失业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发展，同时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不断深化的改革，并且平衡发展地区经济。

3. 创新思路，增加农民收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文科研究员提出，农民增收问题是一个最容易被掩盖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增长掩盖着停滞、平均掩盖贫困、发达掩盖落后。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矛盾，农民的持续增收将不可能。陆南泉教授认为，解决农村问题需要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和克服对农民的政策歧视、改革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还有代表指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防止对农民土地的剥

夺。

4. 关注弱势群体，必须推进制度创新。林凌教授提出，政府承诺帮助弱势群体，但政府不可能包揽。最终必须通过推动改革，把最基本的群众的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魏众认为，农村与城市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不完全由收入的差异导致，而是由于制度安排所导致的。从制度背景来看，改变再分配机制，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最根本保证。我们既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转移上的功能，又要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防止“大跃进”式的不切实际的“全面保障”。

5. 必须重视更新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其他经济转轨国家情况表明，文化传统和社会意识对影响经济转轨进程的重要因素。有代表提出，封建制度在我国超稳定地持续了两千年，其残余意识严重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大障碍。因此，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有必要大力培育诚信守法、平等自由和自强敬业三个方面的社会观念和国民意识。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经济研究所」

#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十五条）

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历史地、客观地、准确地估计和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状况，同时根据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充分估计改革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决定性作用。

围绕 201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从实际出发，提出今后五至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并且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有效措施，对推动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我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快解决改革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1.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创造了重要条件。

基本判断是：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退出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市场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发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了一定进展；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我国用 20 多年的时间，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从计划

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渐进改革之路

这个判断是符合 20 多年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的：

——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劳动力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劳动工资由市场决定等明显增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开始起步，有的已初具规模。随着中介服务市场的规范建设，一个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专业化中介服务体系正在形成。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有企业改革由搞活单个国有企业转变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逐步退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成效显著。通过授权经营等方式，积极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和效益大大提高。坚持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企业集团组建起来。各地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使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具体形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国有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

——基础领域由国有经济垄断的局面开始被打破。近年来，国有公共部门的改革已按市场化的原则展开，电力、电信、民航等领域的垄断不同程度地开始被打破。加快基础领域的股份制改革，逐步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为非国有经济和外资的进入积极创造条件，已成为我国基础领域进一步加快改革的大趋势。

——民营经济的发展充满活力，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投资总额上，都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已由国民经济的补充成长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初步成就。从总体上说，我国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初步被打破，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利益关系或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继续扩大；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医疗保险体制也正在进

一步建立和完善之中。

——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有实质改进。突出的表现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2.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单项制度的安排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目前，结构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改革发展的突出矛盾。

——我国各产业部门、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严重不平衡。商品市场化程度高，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则刚刚起步；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而中西部则较低。这种不平衡严重障碍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整体水平和统一市场的形成。

——微观改革较快发展与宏观改革相对滞后。国有经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缓慢，直接影响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需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要求实现政企、政资分开，减少行政的直接干预，使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不断要求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既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规则，又必须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我国加入 WTO，必须按照 WTO 的通行规则，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扶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又需要一定的区域优惠政策。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

——利益格局变动与利益均衡。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由于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均衡问题越来越突出。

——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引发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我们的建议：解决改革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紧紧依靠制度创新。实现到 2010 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须大胆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在改革的多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整体攻坚阶段， 从多方面实现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至关重要

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今后五至十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紧紧抓住制度创新这个根本，大胆突破限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因素、结构性矛盾，在多方面实现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坚实基础。

3. 加快以股份制为重点的、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严格、科学、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十分重要的攻坚阶段。在今后几年，积极地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实现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目标，使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将对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加快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是当前国有企业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任务。我国的改革实践证明，以股份制改革为主要途径，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而且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出路。在经济全球化和 WTO 框架下，股份制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制度基础。有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都应当通过多种方式实行股份制。

——以优化产权结构为重点，加快形成完善、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环节。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建立和规范运作，要与产权结构及股权比例的重组优化紧密联系起来。应当严格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与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密切结合，

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加快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理人员激励约束机制，格外注重保护小股东利益，实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点突破。

——鼓励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深远影响目前，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加大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力度。在逐步规范的前提下，提高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持股和经理人员融资收购的比例，是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步伐的重要选择。

——加快寻求国有资产管理的形式是实现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至关重要。应当正确地估计和认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保持国有经济合理规模和合理比例的基础上，提高国有资产市场化运作的程度，实现由国有资产向国有资本的转变，并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4. 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拓宽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空间，公平竞争，实现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的实质性突破。

——非国有经济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 20 多年，非国有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是我国推进渐进式改革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就。目前，非国有经济是创造新增就业的主要领域，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实践证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和市场体制的形成。发展非国有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举措。

——实行全面的对内开放，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和限制，实现对非国有经济的国民待遇。目前，在制约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因素中，体制性的制约是最主要的原因。必须为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市场准入、筹资融资、外贸经营权、土地征用、

技术人才招聘等方面，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打破非国有经济的市场准入制度障碍，引入竞争，拓展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和空间。一些产业、领域国有垄断的存在，妨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应当放宽对民间资本的产业准入限制，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壁垒，逐步取消某些产业的国有垄断，对一些赢利水平和市场前景较好的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及一些公共事业，消除民间资本的投资障碍。

——创造条件，积极稳妥地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拓宽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加大金融机构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是进一步发展非国有经济的重要条件。一是允许民间资本拥有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二是在一定条件的约束下，允许民间资本办银行；三是按照市场原则配置金融资源和拓宽民间的投资领域，大力发展证券业、保险业和各类基金组织，分流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减少金融风险；四是清理限制民间投资、融资的政策，允许并保护企业直接融资的权利。

5. 我国加入 WTO，基础领域改革越来越具有紧迫性。打破垄断，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实现我国基础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加入 WTO，给我国基础领域各产业自我调整和发展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当有强烈的紧迫感，抓紧今后的两三年，在我国基础领域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市场化改革上有实质性的突破。

——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政企分开，为加快基础领域改革创造前提条件。政企不分、行政垄断是我国基础领域的重要特征。政府主管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建立起公平的行业管制。

——打破国有经济垄断，建立充分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基础领域改革的优先目标。垄断遏止竞争，进而造成资源浪费，降低效率，阻碍创新，垄断直接以高额利润损害其他经营者，并给消费者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快打破国有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是基础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

——开放市场，产业重组与产权重组相结合，实现基础领域投资